

序

戚墅堰機車車輛工厂，自从一八九八年在上海吳淞建厂起，到今天，已有六十三年历史了。在解放前的五十一年中，在抗日戰爭以前的三十九年間，这个工厂经历了清朝、北洋軍閥、国民党統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由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又达三十六年之久。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侵占戚墅堰后，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了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統治下，工人度过了三年多的苦难生活。这五十一年，是辛酸的艰难的五十一年，也是工人階級英勇斗争的五十一年。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戚墅堰機車車輛工厂的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在向国内外敌人作頑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一九二五年，厂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組織，从此以后，工人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仆后继、英勇頑强的革命斗争。工人們在斗争中，提高了階級觉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經驗，逐渐把自己鍛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戚墅堰地区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全厂职工精神焕发，欢欣鼓舞，一面积极恢复生产，赶修機車車輛支援解放軍，解

放全国；一面协助政府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在三年恢复整顿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全厂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十多年来，特别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厂职工以忘我的劳动、冲天的干劲，制造出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结束了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跨进了机车制造工业的大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铁道运输，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继承革命传统，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斗志，鼓舞更大的革命干劲，我厂厂史编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合作，发动全厂职工群众，写出三千余篇素材，经过调查研究和整理，写成这本厂史。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室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这本厂史还有不少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教。

中国共产党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委员会

一九六一年七月

目 录

战斗在吴淞(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苦难的“龙头厂”.....	1
革命风暴的洗礼.....	12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	18
反对包工制.....	29
打击敌人的军运.....	33
换汤不换药.....	35
迁厂.....	38

在日、伪、蒋夹击中战斗(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

在铁蹄下.....	43
换了招牌.....	48
团结就是力量.....	51
错综复杂的斗争.....	54
瘫痪它! 拖垮它!	57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64

黎明前的战斗(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

“接收”内幕.....	67
“考工”真相.....	71
辛酸的生活.....	73
生产能力“增长”的秘密.....	77
在白色恐怖下.....	82
二月大罢工.....	87
护厂迎解放.....	100

战斗在吴淞

(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苦难的“龙头厂”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前身，是一个修配所。原厂址在吴淞，老工人称它为吴淞机厂老厂。

吴淞机厂老厂，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以官款建成淞沪铁路后，为了装配机车车辆和应付日常的车辆修理而设立的。最初厂址设在吴淞张华浜，那时只有三间前阔后狭的铅皮房子。当时全厂只有三、四十个工人，设备也很简陋。看得上眼的不过是三只炉灶和靠近铅皮墙壁的十只老虎钳台。绝大部分的生产都是手工操作。

谈起这座江南最早的“龙头厂”（江南人把机车叫做龙头）的发展，应追溯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后的情况。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特权，进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当时，帝国主义相互竞争，投资修筑铁路是他们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投资修筑铁路，夺取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控制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掠夺高额利润，贪得无厌地、残酷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建筑淞沪铁路的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是一个为英美垄断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大买办。一八九八年，盛宣怀与英国签订了沪宁铁路借款合同草约，承认英国的借款权，并拟将淞沪铁路作为抵押品。

一九〇一年，盛宣怀积极扩建吴淞机厂的厂房，亲自到张华浜、蘓藻浜一带察看地形，指派张华浜人周某圈收民田。当时那一带的土地每亩价格一般都在一、二百元左右，但是盛宣怀公布一道命令，以每亩六十元的低价，强夺农民的大片土地，使无数农民流离失所。

随着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张，沪宁铁路的主权逐步落入英帝国主义之手。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代表在上海正式签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并将一八九八年草约作废。正式合同条件更为苛刻，它规定借款总数不得超过三百二十五万英镑，年利五厘，分五十年偿还；除了将已经建成的淞沪铁路作为抵押品以外，合同中还规定：营造铁路所用的地基、有关物料、车辆、房屋等项产业，以及以后所建成的铁路本身及该路各项进款，亦一并抵押；合同还规定设立沪宁铁路总管理处，设置办事人员五名，其中中国籍人员两名，由督办大臣选派，英国籍人员三名（包括总工程师在内），由银公司选派，如遇中英人员意见不合，则由督办大臣与银公司的驻华代理人会同商酌办理；总管理处得推荐“有职衔并才干合宜”的中国人担任铁路上的职务；合同的第二十三款规定：“现有之淞沪铁路接授之价值一經議定銀錢已备交总公司之时，该铁路应即行转交归入沪宁铁路……。”由于

这些规定，整个铁路的建筑权与经营管理权，尽在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一九〇四年十月九日(农历九月初一)，铁路总公司收回工价銀一百万两，淞沪铁路正式和沪宁铁路合并了。当时的吳淞机厂，也随之成为沪宁铁路的一个組成部分；直接为英帝国主义控制。

吳淞机厂新厂房于一九〇四年落成，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其实，所謂新厂房，也不过是用紅砖、木材和鉛皮砌造的結構简单的厂房而已。新厂址設于蘊藻浜和张华浜之間，前临铁路，背倚黄浦江；厂左边两里左右有一跨江大桥，是火車通炮台湾必經之路。这一时期，掌握工厂大权的是英国人滕斯頓和卜扑等人。

吳淞机厂新厂房，仅有一号厂(鉗工)、二号厂(車工)、三号厂(打鉄、鋤工)、四号厂(客車)和五号厂(油漆)等五个厂房，設備非常簡陋。所有的机具設備，就連极普通的螺絲，也是远涉重洋运来的英国貨。当时，修理机客車所需要的大小配件，全是向英国順昌洋行买来的，而所謂修造客車，不过是将买来的客車重装一下，添造座位而已。这充分暴露了工厂当时的买办性和附庸性。

工人們在英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的欺凌压榨下，生活极为貧困，誰也提不起劲干活，工厂的生产能力很低。以修理机車为例，大修一辆，要一年左右；中修一辆，要两个月；小修一辆，要一个星期。

一九〇七年，工厂又添建了一些厂房，連同原有的在內，

共有：裝修機車工場、機器工場、打鐵工場、動力房、鍋爐房、裝修油漆車輛工場、翻砂工場、鋸木工場和材料廠等。在生產設備方面，據不完全的統計，有：

設備名稱	台數	設備名稱	台數
握盤鏟機	3	蒸汽引擎	1
車輪鏟機	2	臥式鍋爐	2
旋臂鑽刮機	2	刨機	2
定形鏟機	2	定形鑽機	1
螺型鏟機	1	鏟機	4
磨機	1	水力壓輪機	1
通用銑床	1	剪沖機	1
磨光機	1	大汽錘	1
切管鏟機	1	直板機	1
盤形刀架鏟機	1	木工帶鋸	1
滾板機	1	木工刨機	1
架空起重機	2	鑽木刨機	1
旋樞起重機	1	小圓鋸	1
直流電動機	12(內200匹馬力2台)		

當然，這些機具設備，也都是來自英國的。一九〇八年，滬寧鐵路正式通車，為了適應這一需要，工人的數量也隨之增加了。據資料記載，當時有工人二百零六人。這時，工廠才算初具規模。

就在這一年，工廠在黃浦江邊建造碼頭一座，接通軌道，直接裝卸外洋來的機器、材料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大量傾銷的商品。

一九〇九年，江苏省的沪嘉铁路和浙江省的杭嘉铁路（即后来的沪杭甬铁路）工竣通车，所有机车车辆也完全由吴淞机厂修配。直到一九二一年，闸口机厂建成，沪嘉铁路和杭嘉铁路的修造机车车辆的任务，才移归闸口机厂。

据记载，一九二二年以后，工厂的生产设备续有增添。置有起重三六点六公吨吊车一座，螺旋机等亦有所增添。一九二四年，吴淞机厂工人增加至七百四十七人（在包工制奴役下的临时工未统计在内）。

二 为了通过沪宁铁路掠夺中国人民更多的财富，英帝国主义牢牢地抓住沪宁铁路（后来的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的心脏——吴淞机厂。在新厂房建成以后，掌握全厂大权的，先后有芬次和毛尔维等英国佬，其中要算毛尔维担任厂长的时间最久，直到一九三四年三月才离职。前后三十六年，整个工厂为英帝国主义统治着。

当时，工厂的管理制度极其腐朽。除了“洋厂长”外，各工场的生产都归工头指挥，没有技术人员，在生产上，排列紊乱，漫无规章；如车辆工场与机器工场距离很远，工件运输耗时费工，修理技术上更是墨守陈规。

在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吴淞机厂，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一九三三年前后的一年中，工厂生产水平是：大修机车七辆、客车八辆、货车五十二辆，重造客车四辆。产品质量也不高，在毛尔维离职以前（一九三四年三月），当时沪宁线各主要机车牵引力极低：

机 車 类 別	牵 引 力 (吨)
B 字 机 車	950
C 字 机 車	410—510
D 字 机 車	1,500
E 字 机 車	510
F 字 机 車	調車不过100—200
G 字 机 車	810
部 字 机 車	1,300

由此可见，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資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的目的，无非是对中国进行經濟掠夺；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經營了許多輕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經濟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 吳淞机厂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一样，是腐朽的、落后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是沒有独立发展前途的。

吳淞机厂的工人，在“洋厂长”和“土皇帝”(工头)的統治下，长年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把头的残酷剝削和压迫，因而工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异常坚决。

“洋厂长”——英国人毛尔維，在新厂房兴建时期，还只是土木工程师的繪图样的助手，由于他压榨中国工人“有功”，得到上司賞識，当上厂长。工人們知道他的底細，所以背地里叫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頁。

他“小打样”。

“小打样”当了厂长以后，改变了用一个中国“总头脑”来管理工人的制度，把英国佬直接安插在工场中，各个工场另设“头脑”（工头）和“副头脑”。“小打样”还亲自驻厂，管理漆、木、机车等部门；冷作、打铁等部门先后由麦登、孟司菲尔特管理。“小打样”经常下工场巡视，任意打骂中国工人。他看到工人偶尔讲一句话或休息一下，就举起拳头乱打，提起脚来乱踢。油漆工场工人周荣生为了活命，打疟疾时还硬撑着上工。工友们相互照顾他，让他到车厢里休息。谁知道给“洋厂长”毛尔维和工头周长根发现了，毒打一頓，周荣生连病带伤，连吓带气，回去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当时工人上工，碰见洋人要向他们立正行礼，路走慢了，也会遭到洋人的责骂。工人们受了欺侮，表面上不敢反抗，心里却说：总有一天要斩断“猪脚爪”、“洋火腿”。

“小打样”还用罚工资和停工的办法，来压制中国工人。有一次，刘师傅上厕所去了，“小打样”不容分辩地扣罚了他一天工资；工友林阿大把两个车厢接头处的电丝槽做得稍微大一些，其实，只要用老虎钳钳一下，就同样顶用，可是被“小打样”撞见了，就硬说林阿大“拆烂污”，立刻停歇了他的“生意”。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是无孔不入的。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工人叫做“外国冬至”），“小打样”派工头和领班向全厂工人索取两天工资作“礼金”。圣诞节前，凶神恶煞似的“小打样”到各个工场乱窜，专找工人的岔子；目的是叫工人多送礼金，他好多捞“外快”。等到“外国冬至”的

“錫渣”烧过以后，“小打样”来工场的次数就少些；就是来了也是一晃而过。当洋人們“衣錦还乡”的时候，工人又倒了霉，各部門的工头为了要孝敬洋人，就到处奔走，向每个工人勒索“礼金”。

“洋厂长”还利用封建把头来統治中国工人。这些封建把头，是外国資本家压榨、奴役中国工人的爪牙，他們平时作威作福，如狼似虎，工人对他們有着刻骨的仇恨。

封建把头倚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狐假虎威。他們索取賄賂，随意敲詐工人，任意停工人的“生意”。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在饥饿綫上掙扎，連出卖苦力也不容易。“进厂难，难进厂”，每个老工人都亲身尝过这种滋味。老工人李桂元，在一九一六年花钱、托人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封洋人的介紹信，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封建把头，因为没送“见面礼”，这个把头就从中作梗，說他个子太矮，干不了活，不能进厂。第二年，这个把头添了“貴子”，李桂元的娘东拼西凑借了十二块銀洋，到上海定制了一副金鎖片送去，这个把头收了，这样就讓李桂元进了厂。

进了洋人和封建把头統治的玉厂当学徒，生活是极其痛苦的。学徒进厂，先要預备礼物，到工头家里去拜师傅。冷作間工头收徒弟，就先要学徒到他家做洗衣服、带孩子、挑水、拖地板、买菜等家庭杂务，在厂里只是挂个空名，进厂時間很少。在学徒期間（三年或五年），除了飯錢和剃头錢以外，所有劳动收入統統落入工头的腰包里。有的工头还用徒工来頂正式工人的名額，吞吃工資。当时，学徒就是这样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一般底工(基本工人)的景况,比学徒好不了多少。每到发工资时,工头就要向工人强收“月费”,按各人工资的多少,每人收三元到七元不等。逢年过节,工人还得给工头送礼。那个工人送的礼丰厚,工头就会在来年稍微加一点工资;那个工人没有送礼,就会戴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七灾八难,甚至“打破饭碗”。工人周耀庭月月收入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一连两次没向工头送礼,就被工头加上“磨洋工”的“罪名”,赶出厂去。工头是个二花脸,有时会对不送礼的工人说:“现在活少,没有事情做,你不要来,等有了活,再喊你来。”有些工人花钱“运动”一下,工头又会转过脸说:“现在活多了,你来上工吧!”

有些工头还用“标会”的办法来剥削工人。他们总是标“头会”,把得到的会钱拿去放债,借给生活困难的工人,进行残酷的重利盘剥;而受盘剥的工人,却是债台高筑,愈来愈穷。多数工人受愚弄,连“会本”也收不回。

有些工头利用各种封建迷信的组织,作为他们笼络工人、欺骗工人、剥削工人的工具。工头周阿宝组织一个“佛教居士林”,既吞吃了一百多个工人捐助的“功德费”,又利用宗教来麻醉工人,使工人把苦难归之于命运,逆来顺受,忍受剥削、压迫。工头张三毛组织了一个“救火会”,强迫他手下的八十多个工人加入,每晚都得去签名报到,否则就要挨骂或者停生意。类似这样性质的帮会还很多,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在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下,受包工制奴役的临时工的命

运最为悲惨。临时工和底工不同，底工是厂里的基本工人，名义上是不得随便辞歇的。临时工是由工头招雇来的，专门做工头从厂里包下来的活，受到层层剥削，生活完全没有保障。临时工做一天工，算一天钱，活少就无工可做。当时厂里的冷作工、木工、漆工、翻砂工，几乎全部都是临时工。现在修机車間的老师傅杨银林，当时曾一连做了六年临时工。厂里虽然有着明文规定，说临时工满六个月后可以转为底工，但实际上是个大骗局。有些临时工将届期满，工头就借故把他们一脚踢开，另招一批新的临时工，工头却从中大发横财的。

“洋厂长”和工头，赛似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工人头上。当时，工人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反映出工人心头之恨。

“洋厂长”专横赛皇帝，工头凶残胜霸王，
好似大山压头顶，工人血汗都吸光，
但愿有日东风起，刮去乌云见曙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的生命没有保障。生病、因工负伤的工人非但没有补贴，反而会因此失业。吴淞机厂的劳动条件很坏，工人大都在露天干活，夏天热得象火烧，冬天冷得牙床发抖；工场里没有什么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如推轮子的工人张春江就被轮子轧死；工人朱阿康在操作时跌在车沟里，脑血直流，洋人见了却若无其事。有个五十岁的老铆工沈师傅，在高空作业时从半空摔下来，伤势沉重，没钱医治，“洋厂长”不理，当夜就死了。

工人受尽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愤怒的火焰在燃烧。工人们自发地采取“磨洋工”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巧妙地向

“洋厂长”和“土皇帝”展开斗争。

直到现在，大家还津津有味地谈着“巧打许帐房”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工人们如何团结起来进行自发斗争。

在厂里的“把头”中，最坏的要算是许帐房了。帐房是算帐的，为了讨“洋厂长”的喜欢，许帐房却经常向车间里跑，监视工人劳动，找工人岔子。凡是看着他看不顺眼的工人，便加油添醋地向洋主子报告。工人吃他亏的真不少。大家虽然恨他，但表面上谁也不敢得罪他。

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热，别说干活，就是穿着单衫坐一会，衣裳也会湿得象水浸过一样。许帐房偏偏在下午最热的时候下工场，东转转西转转，一转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他走到老郝的身旁，死盯着他的两只手，看看是否出力干活，老郝气极了，便放下手里的大锤，使劲拍身上的灰，灰尘象雾一样，冲向许帐房，气得他骂着走开了。老郝的行动，启发了大家：要让他早点滚开，就得想法治他。他一离开老郝，大家估计他一定要往炉子间去，陆师傅一个急转身，在通往炉子间去的二门的石条上涂上机油。果然不出所料，许帐房板着一张煞神一样的脸，一摇一摆地向二门走去。

“咔嚓！啪咚！啊唷——”

许帐房踏着机油滑倒了，摔了个四脚朝天，一副近视眼镜，抛在三步远的墙角下打碎了，陈炳林、陆师傅等人早已做好了准备，一看许帐房跌倒，大家蜂拥而上。

“许先生，你摔痛了没有？”

“許先生，这个門就象地獄一样黑，不好走吧。”

大家装模作样地七嘴八舌地問这問那，看他快要爬起来了，有的拉手，有的捧头，有的干脆一把拉住他的胸襟，他还没站稳，大家把手一放，让他再来个倒栽葱。直到他連跌三次，大家才让他站住脚。

“許先生，你身上有很多灰。”

“許先生，让我来給你拍一下。”

“真可惜，这么好的衣服都弄脏啦。”

于是，大家又在許先生身上噼噼啪啪地重手重脚的拍起灰来，把手上的油、灰，痛快地往許帳房的身上措，有的一面措，一面打。刹時間，許帳房活象一只快要断气的“灰毛狗”。

大家觉得为他“服务”得差不多了，就停了手。等大家一松手，他头也没抬，弯着腰，一手擦着长袍，一手拎着那副破眼鏡，嘴里不断喊着“啊唷啊唷”，好象一只被砍断了尾巴的野狗，狼狽地逃跑了。

革命风暴的洗礼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六三”以后，上海工人参加了斗争，发动罢工，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的工人坚决起来进行罢工斗争，使交通断绝，给全国以巨大影响。吴淞机厂工人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和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异常愤恨，组织十人团，响应全国工、学、商各界的游行示威，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举行罢工、

捐款，支援收回青島、收回膠濟鐵路的愛國運動。十人團還利用吃飯的時刻，召開會議，進行宣傳活動。工人們寫了無數“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抵制日貨”、“廢除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拒絕和約簽字”等標語，到處張貼；同時，散發油印傳單，不少不識字的工人，也爭先恐後地拿着傳單去問個究竟。反帝反封建的怒火燃遍全廠。工人們還推派代表到滬寧鐵路局交涉，要求拍電報給北洋軍閥政府表明態度。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北洋軍閥政府在全國人民的抗議和壓力下，下令批准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後，工人方才復工。

一九二〇年，滬寧一帶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和加緊搜刮，加上奸商投機，操縱市場，糧價飛漲，工人生活維持不下去了。滬寧鐵路上海機務段的司機、司爐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這次罷工獲得勝利後，吳淞機廠全廠五百多工人馬上行動起來，要求增加工資二成，星期日工資照發，並集體簽名，寫了一封請願書送給鐵路局。在這封請願書上，大家簽名時故意簽成圓形，以免遭受反動勢力迫害帶頭簽名的工人。經過工人們幾度交涉，“洋廠長”才答應例假工資照發，每天增加工資一角。這一次罷工鬥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廠工人的鬥爭信心。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全國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有了黨的領導，方向明確，聲勢更為浩大。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成立總工會、反對軍閥高壓政策爆發的政治大罷工，遭到了直系軍閥

吳佩孚的殘暴屠殺。當時，全國各鐵路工人、各工團、各群眾團體，積極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紛紛舉行罷工或通電表示聲援。吳淞機廠也推派代表出席了在橫濱橋中央大禮堂召開的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鬥爭大會。當時，唐山鐵路工廠的工人派了兩位代表，偽裝成玩雜耍的人，躲開敵人爪牙的跟蹤，來到吳淞機廠附近，對工人宣傳“二七”罷工的政治意義，使大家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從而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就更加憤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舉行罷工是“犯罪”的行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訂了各種“暫時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等規章，殘暴地壓制工人的正當要求。當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宣布了特別戒嚴令，各種集會、結社一概禁止，即使商會、學生會也不准召開。報館、車站，明里有軍警把守，暗中還有密探監視，各工廠、鐵路也被武裝的軍警包圍，不許工人自由出入。這時，吳淞機廠的“洋廠長”和工頭們也對工人嚴加監視。這一切說明了國內外的反動派對日益壯大、日益覺醒的中國工人階級感到莫大的恐懼。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鐵路總工會在上海成立。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期間，上海總工會也在劉華、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的領導下成立。黨進一步加強了對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黨号召全上海人民起來實行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以進一步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這時，吳淞機廠的“洋